

汉斯·哈贝 [瑞士] 著

战争亲历者 自叙

丛书



Ob tausend fallen

张黎·译

Hans Habe

Th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P.L.A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文学作品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

表现了法国外籍军团第二十一兵团

自1940年5月开始

在反对法西斯德国入侵的战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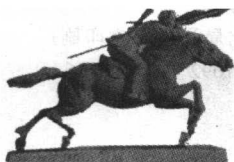
从开赴前线到全军覆灭的过程

纵有千人倒下

纵有千人倒下

[瑞士] 汉斯·哈贝 著

张 黎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纵有千人倒下/(瑞士)哈贝著;张黎译.-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5033-1848-1

I.纵… II.①哈…②张… III.报告文学-瑞士-现代

IV.I56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7946号

书 名:纵有千人倒下

作 者:汉斯·哈贝

译 者:张 黎

责任编辑:张 鹰

装帧设计:符晓雷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吕红英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bs@public.bjr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205千字

印 张:16

印 数:1-10100

版 次:2005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33-1848-1/I·1445

定 价:2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纵有千人倒下》及其作者

《纵有千人倒下》的作者汉斯·哈贝(Hans Habe 1911—1977),是个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原名叫雅诺什·贝开西(Janos Bekessy),由于他晚年定居瑞士,故称其为瑞士作家,又因为他的写作生涯始于德国,一生用德语写作,习惯上也称他为德国作家,或德语作家。汉斯·哈贝是他用得最多,也是德语国家公众最熟悉的笔名。哈贝是在1919年尼寇劳斯·霍尔蒂法西斯专政时代,与家人离开匈牙利迁居奥地利的,青年时代先后在维也纳、海德堡读法律和文学,1929年开始在奥地利、德国、瑞士从事新闻工作。在德国法西斯猖獗的那些岁月里,他出版了几本批判法西斯倾向的小说,从而上了黑名单。其中描写德国流亡者的《三个越境者》,1937年出版后,立即被翻译成18种语言,产生了广泛影响。1938年,哈贝流亡去了法国,志愿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与法国人民一道抗击德寇入侵。由于法军内部投降派势力的破坏和捣乱,本来就装备不佳,士兵素质较差的外籍军团,被德军打得溃不成军。哈贝逃出俘虏营之后,途经瑞士、西班牙、葡萄牙于1940年底流亡去了美国,1944年参加美国军队,参与筹备战后德国新闻事业建设。1945年,哈贝作为美军少校返回德国,在美国占领区创建了多种报纸,如《法兰克福观察报》,《鲁尔报》,慕尼黑《新报》等,自己曾担任《新报》和慕尼黑《每周回声》画报的主编。二战以后,哈贝重操新闻、作家职业,写过许多通俗小说和电影脚本。他的重要作品除《纵有千人倒下》之外,还有四卷本的《记者生涯》和记述战后新闻生活的《零点岁月》等。

《纵有千人倒下》是一部自传性纪实文学作品。该书采用作者自

述形式,记叙了一支法国外籍军团,自1940年5月开始,在反对法西斯德国入侵的战争中,从开往前线到全军覆没的过程。作者所在的法国外籍军团第二十步兵团,筹建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士兵来源主要是三种人,一部分是来自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法西斯国家的难民;另一部分是无国籍的外国人,他们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战后取得法国国籍;还有一部分,包括作者在内,是来自各国的反法西斯战士。这些人在法国经过短期军事训练,便开往前线。这支队伍虽然在物质装备和人员素质上并不能适应这场战争的需要,可战士们面对人力,物力,技术装备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却斗志昂扬,富有牺牲精神。由于法国军官中的投降派作祟,战争指挥不利,不战自败,士兵伤亡巨大,参战不到半年,即全军覆灭。

作品从外籍军团第二十一团开赴前线写起,作者作为一名侦察兵被派往前线侦察敌情。由于友军配合不利,法军不战自败。二十一团仓促撤退时,他和几个战友被遗忘在前线战壕里。经过许多艰难困苦,他们才找到自己的团队,可在一次战斗中,由于指挥失误,退路上的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桥,被前面指挥官炸掉,切断了后来士兵的退路,而另一座在战略上应该炸掉,以阻挡敌人前进的桥,却被完好保存下来,使敌人长驱直入,所有未退走的法军士兵,大都成了德军炮火的牺牲品。作者大难不死,侥幸逃生,全团兵力绝大部分丧生在德军炮火之下。这时传来法国政府投降的消息。团长鉴于作者是犹太人,又写过反法西斯小说,而且是上了黑名单的,一旦被德国人俘获,便有生命危险,于是劝他毁掉士兵证书和一切标志,更名换姓,远离二十一团,混迹于别的溃退的法国士兵当中,设法逃生。在好心的士兵帮助之下,他取得假姓名和有关证件,在德国占领区一处俘虏营里,他充当了德国人的翻译官和俘虏营的头头,竭力取得德国人信赖,为他们采购德国人买不到的物品,借机与外界取得联系。在一家专门为德国士兵取乐的妓院老鸨和一些普通法国人帮助下,他历经曲折,终于脱离虎口,奔向非占领区。

这部传记性文学作品,由于情节曲折紧张,有很强的戏剧性,颇像

一部冒险小说。作者称它为“一则报道”。作品自始至终贯穿了虔诚的宗教思想,书名《纵有千人倒下》取自《圣经·诗篇》第91篇中的一行诗,仿佛是暗喻,作者之所以大难不死,是上帝冥冥之中保佑的结果。作者1940年底流亡到美国,1941年在纽约写完这部作品,1943年在美国拍成电影。后来,该书被译成俄文,仅在苏联便发行了一百万册,二战以后翻译成多种文字,又印行了四百万册,其影响之广泛,可想而知。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在给作者的一封信里说:“您的书将永远存在下去。”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称这部作品写得“十分出色”,说人们会“不停地阅读它”。德国作家孚西特万格称:“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以如此巨大的笔力描写过战争的恐怖。”德国作家赫尔曼·凯斯滕称这本书是“我们时代最激动人心,最扣人心弦的逃亡故事。”有评者认为这本书“远远超过了雷马克等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家”。更有评家认为:面对如此巨大而错综复杂的灾难,连托尔斯泰都会无从下手的。

第一卷 战争与撤退

1751 式步枪

战争突然间降临到大路旁。

1940 年 5 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接到法国集团军米兰波上尉命令，深入德军前沿阵地进行一次侦察。头一天我离开设在阿尔萨斯 - 普发奋霍芬的十二集团军驻地，视察了几处法军侦察哨所，弄清几个不确切的报告。前几天，我刚刚参加过一个米兰波上尉为十二集团军各团的步兵侦察员举办的训练班。我所在的团，是这些团中的一个，它的名称叫“外国志愿军第二十一兵团”，它是战争开始时筹建起来的，目前正在毗邻的毛门海姆待命。

我在前面几个侦察哨所看到的事情，并不使我感到惊异。米兰波上尉让我们做好最坏的打算。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不寻常的人。我们在阿尔萨斯逗留的那些日子，始终未弄清他的秘密。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雄，可他从来不佩戴勋章；右胸上佩戴着一枚印第安人头像，这是第二办公室的标志，是用来代替绶带的。从他的军事知识来看，他一定是个职业军人。一位来自米兰波故乡的年轻炮兵军官说，上尉是巴黎大学的数学教授，他的猜测完全是可信的，人们注意到上尉在数学和几何学方面有着惊人的知识。他的学生说，他根本不姓米兰波，他接受这个姓氏，像接受不同的职业一样，只是为了掩盖他的真实身份。前几年他在法国侦察机关，作出了不寻常的成绩，德国人非常熟悉他，他们甚至出高价悬

赏他的人头。

在我出发前,米兰波上尉用痛楚的语调对我说:

“您听着,下士,您会遇到意料不到的事情。您会发现,有些哨所甚至有集中供暖设备,可您在那里却看不见敌人。所到之处,您都能找到香槟酒。”他在空荡荡的乡村电影院大厅里踱来踱去,这里是我们的课堂,这个苍白的男子汉,脸上布满皱纹,军装上佩戴着萨佛那罗拉像章。“您要是看见香槟酒箱子,就开枪,这是我的命令!”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要是明天就爆发战争……”

他说这些话的那一天,战争已经持续了8个多月。

但是,这场战争,米兰波上尉已经知道,而我们只能猜测,这场战争天晓得潜伏在什么地方,在亚尔丁森林里,在比利时田野上,在卢森堡那些温馨小巧的房舍后面,战争还没有开始呢。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清晨,我穿过碧绿的田野,返回普发奋霍芬汇报,米兰波为了简便起见,把这个含有5个“F”的阿尔萨斯地名,改成了“桑科夫”,汇报在军事情报中又称“无可奉告”。

于是,战争突然间降临到大路旁。

我同另外两个团的步兵侦察员约好碰头的时间、地点,他们是派出去执行检查通道任务的。我们上午8时,在普发奋霍芬的三叉路口会面。我是最后一个到达的,没待我说话,他们便抢先对我说:

“德国人开进了荷兰和比利时。明天早晨我们必须返回团里。”一个小时之后,第一批轰炸机飞过这座含有5个“F”^①的寂静城市的上空。

几个月的时间,在耗尽精力的等待中过去了。没有人能够预见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因为没有人知道,战争什么时候开始。

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波兰被打败了,但那还不是战争。法兰西笼罩在阴影之中,在马其诺防线后面。德意志笼罩在阴影中,在西

^① 原文为 Pfaffenhoffen,这个地名拼写法含有五个F。

部屏障后面。西格弗里德防线。等待，等待，等待。人们在谈论就地作战。在巴黎的歌舞剧院里，人们讽刺所谓“浅滩战争”。有战争的传闻，却没有战争。有和平的新闻，却没有和平。

在马其诺防线的纵深处，在比利时国境线上，在阿尔卑斯山里，在海滨，所到之处，战争都变成了士兵的游戏。与其说是百万士兵，勿宁说是百万新手。战胜希特勒？没有战争？在法兰西停火？可军火尚未提到日程上来呢。也许是1914年的精神又复活了，炮火连天，但是，人们只是打扫阿尔萨斯乡村的街道，人们在将军面前列队通过，人们举枪致敬，人们把皮靴擦得锃亮。人们逃避工作；这是最大的赛事。微小的嫉妒和微小的虚荣心以及对别人的不信赖。1940年5月就是这副样子。

有朝一日，人们相信战争开始了。我们4个人，同一个团的步兵侦察员，应该在星期一返回我们的毛门海姆驻地。

矮个子的加莱和我决定，星期天下午再去钓一次鱼。

矮个子的加莱，是匈牙利人，前几年在巴黎任摄影记者。这个消瘦而又黑乎乎的年轻人，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天生就不是打仗的材料。尽管这样，战争一开始，他还是报名参加了志愿军。

“终于打起来了，我很开心。”当我把鱼钩甩出去时，他说，“八个星期以后，就完了。”

“你相信？”

“没错儿。”

听他说话的口气，似乎战争的胜负已成定局了。

这是第一个和煦的星期天，太阳照耀得如8月的天气一般。田野一片深绿色，微风轻轻吹拂着禾草。水面散发着只有夏天才能闻到的气味儿。略微有点腐败。村庄在我们身后，安适而寂静。

加莱突然抬头望去。

“飞机！”他并未卧倒，只是凝视着天空。

3架飞机低空飞行，掠过普发奋霍芬，像擦过教堂塔楼一样。为了

测试一下刚刚学到的知识,我不无骄傲地解释说:

“梅塞施密特!”^①

我从飞机的三角形机翼,辨认出这是德国歼击机。开头它们似乎是以极快的速度离去,然后突然掉过头来,在我们的草地上空盘旋。机关枪开始呼啸。

“他们在向我们射击。”加莱说,手里依然握着钓鱼竿。

小溪对岸一个渔夫骂道:“畜生!”因为一条大鱼从他手里逃掉了。

尽管我们处于炮火之下,却仍然未预料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我们已习惯了把一切都视为玩笑,至多当成训练,一声喊叫还是惊醒了我们。我们发现了一辆翻倒的儿童车。它是绿色原野上的一个白点。一个女人一身白装,伏身在儿童车上。她喊叫着。飞机又在小城上空盘旋起来。教堂塔楼上响起警笛声,晚响了5分钟,警笛一再发出拉长的鸣叫声,掩盖了那个女人悲痛的哭声。

我们奔跑着穿过田野。

那位母亲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死去的孩子。机关枪子弹穿透儿童车篷,击中了孩子。我所看见的第一个战争牺牲者,是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孩子。

我们返回村庄的时候,人们正纷纷离开他们的住宅。那些惊愕的面孔,更多的是流露出惊讶,而不是恐怖,它们凝望着那没有一丝云彩的湛蓝天空。火车站上有3个工人,原想钻到一辆车厢下躲藏,却被子弹击中脊背。他们已经死了。警笛沉寂了。莫里兹啤酒酿造厂的烟筒上,站着一只仙鹤。

我们返回毛门海姆时,迎接我们的消息是上校发布了处于戒备状态的命令。禁止不戴钢盔上街,严禁离开村庄,夜里不准脱靴子和衣服。离开驻防的房屋,只准沿着墙壁行动,而且只准依次行走,不准并肩而行。禁止星期天的礼拜活动。

^① 一种德国歼击机,以其设计师梅塞施密特命名。

我们最初感觉到的战争，是一条纪律严明的措施。法国军官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把纪律混淆成刁难。他们的纪律观念十分模糊，分不清原因和效果。他们说纪律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他们认为教育士兵遵守纪律，无异于折磨他们。毛门海姆接到德国人入侵比利时消息的那天，有4个人因为把帽子的尖顶压扁被关了禁闭。我们上校和连长在解释关禁闭的原因时说，应该让敌机以为毛门海姆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小村庄”。但这并未妨碍我们每天在连部狭窄的院子里全体集合两次，我们站在那里，两百人直挺挺地拥挤在连部和一个酒馆之间，这是德国飞机理想的猎获物，对于德国侦探来说，是理想的目标，大部分阿尔萨斯人，只穿着衬衣，伏在酒馆的窗口，兴致勃勃地倾听着我们军官的每句话。

在毛门海姆，我跟8名团侦察兵住在主街道旁边一幢漂亮的农舍里，我是他们的头头。我们的管家是个善良的法国人，他们嘴上说的是德语，却自认为是法国人。我们住进去的时候，房子里只有70多岁的农民和他的儿媳，还有4个孩子，儿媳的丈夫4个月之前，就去了马其诺防线。我跟老人家很快便结下友谊，这主要是因为我懂得对他的射击技术深表钦佩。在我们这些来自五大洲的士兵当中，老格吕特尔战争经验最为丰富。他整天用枪打鸽子。

4个人从普发奋霍芬返回来的那天，老人的儿子回家来住了24个小时。这是一个身材高大而强壮的人，生着一双透亮的蓝眼睛，他是一个要塞步兵团的下士，40岁左右。他首先察看了奶牛，然后拥抱了他的妻子，过后他便坐在铺着台布的桌旁，开始同他父亲讨论政治问题。窗子敞开着，我们在院里劈木材。父亲是跟德国人一块儿长大的，作为德国士兵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是个法国爱国者。儿子是在法兰西受的教育，在两次大战之间，享受过法兰西的好处，现在身着共和国军装，期待着德国胜利的到来，思想上已经在为德国士兵准备营房了。这是“一个住在德国的法国人或一个住在法国的德国人……无处下赌注”，像夏米索对自己说的那样。我就是这样认识了当时的阿尔萨斯

人，一种合法边界上的边民。

我们知道，我们在阿尔萨斯至多只能停留几天，由于德国人在比利时发动了攻势，对于我们来说，去比利时防线已是确定了的。我们尽力设法摆脱兵营纪律的束缚，头一天晚上我们便单独地悄悄溜出营房，在村边找到一家可以“避开哨兵”的酒馆。

酒馆里已经人满为患。德国人从清晨起便把哈格恼城置于他们炮火控制之下。居民们迄今为止处在马其诺防线后边，仍在自欺欺人的安全感中晒太阳，从未想到过要离乡背井，现在却晕头转向地逃跑了。当局未想到德国炮兵会越过防线开火，直到今天他们才意识到，要动员居民离开当地。

酒馆里每张桌子旁边都拥挤着许多家庭，人人都显得一筹莫展的样子，男人们身着星期天盛装，女人们头戴绣花黑帽，乡下姑娘们穿着玫瑰色的绸衬衣。多数家庭都牵着自家的狗。女人们把狗抱在怀里，男人们则设法让狗保持安静，可那些狗汪汪地叫唤着，要挣脱拴在脖子上的皮套，女招待被绊得踉踉跄跄，整个酒馆简直成了一个狗圈。

我们终于在一张桌子旁找到了位置，这里只坐着父亲、母亲和女儿。母亲怀里搂着一个食品筐，里面装着一些煮熟的鸡蛋，一只烤鸡，还有红葡萄酒，裹着干干净净的餐巾。女儿是个小胖墩儿，头戴草帽儿。她想冲着我们微笑，可那微笑变成了一脸怪相，她抽抽泣泣地哭起来。她的眼泪落在胳膊上那个襁褓似的包裹上。难民们随身携带着各种各样的多余物品，值钱的东西却都留在家里。父母不时站起来，走到庭院里，去照看他们那头猪，这家人随身赶着一头猪。此时那头猪拴在酒馆的庭院里，跟另外七八头猪在一块儿，它们都是用这种方式赶出来的，关在一个临时猪圈里，等待着屠户来挑选。

我们坐在桌旁，不知说什么好，别的士兵也都默默无语。他们像我们一样，都是些“蓝蚂蚁”，由于我们全都身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天蓝色新军装，人们便这样称呼我们，这些士兵都是初上火线的人。我们这张桌子上那个家庭的父亲，从外面返回来，同妻子商量屠户的加价。

他们争执起来。女儿在哭，狗在叫，啤酒变得温吞吞的。

突然，狗都停止了叫唤，在谛听什么。我们已经听到越来越近的飞机轰鸣声。这是德国发动机的噪声。盟军飞机发出的是长长的金属声，德国发动机则像喘气一样，发出刺耳的低音。

店家跳起来，直奔开关，闭了灯。机关枪声嗒嗒地响起来。无人说话，无人喊叫，连狗都安静下来。影子忽隐忽现。“别站在窗户旁边！”一个男人悄悄对他女人说，好像飞行员能听见他似的。我们桌上的男人站起身来，想到门口去，他女儿把他拉回来。

后来变得鸦雀无声，这些梅塞施密特飞机全部离去。店家开了灯。我感到自己羞得面红耳赤。桌子底下出现钢盔。方才我就注意到了人们的目光，我们的钢盔在酒馆里同女人帽子上的花朵形成刺眼的对比。如果说方才那目光里带着犹豫，疑问和胆怯：人家会保护你们吗？人家会信赖我们吗？那么现在那目光里则充满了敌意和绝望。一个士兵戴着歪歪扭扭的钢盔，从桌子底下爬出来。他试图露出一副微笑的面孔，好像要说，他只是开了一个玩笑，可那微笑的面孔做得很不成功，像一件毫无用处的商品货样儿似的，不得不缩回脖领里去。这士兵花了好大气力，用下巴顶着桌边儿，才钻出来，坐在他旁边的女人，怀里抱着孩子，她无动于衷。

店家站在门口，向坐在我这张桌子旁边的那个男人招手示意。他们低声嘀咕了一会儿，那男人又返回来，不再跟他的女人争执。他说：

“我把猪卖了。”望着他女人那询问的目光说：“它死了。”

次日清晨，我们从毛门海姆向比利时前线出发时，我们当中无人相信，我们会立即被派往第一线去。我们坚信，我们将在一段平安无事的战线上度过几天，这种看法并非基于那种幻想几天便能取胜的天真烂漫的乐观主义。我们有充分理由不相信这种乐观主义。

“二十一团”的历史是这样的：

从1939年9月开始，法国人征召了一批外国志愿人员。或多或少都是志愿来的。在法兰西生活着数千年轻的外国人，主要是在巴黎，他

们未能取得国籍。有贵族出身的白俄,有加里西亚犹太人,无护照的难民,罗马尼亚矿工,有寻找冒险的瑞士贵族子弟,有逃避霍尔蒂将军专制统治的匈牙利人。有些人是孤身一人逃到法国来的,另外一些人则是童年时期跟随父母到法国来的。只有少数人有护照,许多人都被称为“黑人”,因为人们不愿意相信,他们什么时候曾经有过护照。每个人都渴望得到一本护照,渴望取得法兰西国籍。法国人答应他们,战后便成为法国人,成为有护照的人,平等的人。

可也有另外一种人。数以千计的西班牙难民,共和派,在集中营那种不体面的环境里忍饥挨饿。征兵的人们在营房穿来穿去,答应给那些经过斗争考验的人一身军装,给他们自由,而后再答应给他们惟一正式的证件。眼下他们得到的是武器。

我属于第三种人,这种人为数很少。人们对他们尊敬但不信赖。尊敬,因为我们是从外国来的,战争爆发的时候,会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斗争。我是从瑞士来的,持有有效的护照。不信赖是因为只有傻瓜才相信这是一支十字军。

我们这些人首先被组织成一支外籍军团,可是,大多数人都不甘心被雇用5年,更不愿意战后继续服务,人们觉得这场战争很快会打赢。用那些冒险分子、犯罪分子、难民来服役?军方找到了一条出路。先组成两个,后来又组成3个外国志愿兵团,称外国志愿兵。他们只需在战争期间受雇佣。对待德国流亡者则采取另外的态度,他们在拘留营或劳役之间选择,二者都在非洲。充当外籍军团的劳务队,不发给他们武器,只发锹镐。

我们这些奥地利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俄国人、葡萄牙人、希腊人,共有来自23个国家的人,都得到了武器。此外,我们可以称自己为军团士兵。绿衣领上佩着火红的榴弹标志,白色小帽佩制服。《那是血肠》作为我们团的进行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有特权。我们接受外籍军团的高级军官指挥,跟上士和下级军官,当然是法国人,一同享受第二等人待遇,不是跟流亡者,因为他们是第三等人。在军团中有

一种外籍军团精神,除此之外,打了胜仗之后,可以立即换穿便服。人们完全有理由感到满意。

我所在的那个团,称第一团,不同于以二十一命名的“真正”外籍军团的第一团,它是在战争爆发的第二个月成立起来的。我们的训练是从1939年11月中旬开始的。后来的志愿人员,不顾我们事先受过训练,也都分散到团里,因此在1940年这个炎热的5月天里,当我们离开阿尔萨斯的时候,我们队伍里有许多才当过8周、7周,甚至6周兵的人。

炮火的洗礼

这一次开赴前线简直是一次以攻为守。法国的国防力量水平是低劣的。阿米昂斯和阿拉斯已经陷落,拉翁和朗斯也遭到威胁。尽管我们的军官大谈反攻,但却没有人相信他们。不论他们说什么,也不论他们怎么说,那些话都没有说服力。在阿尔萨斯甚至有传闻说,13个将军被人按照军法处决了。是什么人传播这些消息的,无人说得清楚。一夜之间这传闻就不胫而走,人们从各个方面都能听到它。这里面总是有些蛛丝马迹,军队最高统帅确实辞职了,不知为什么。报纸来得很迟,而且没有什么内容,像那些充满谎言的报纸一样。这是一场反攻?……人们都在摇头。

我们从毛门海姆走到一个火车站,11公里远的路程,到那里去登上一列运载牲畜用的货车。为此,全团人马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因为谁都不敢让大队人马在公路上行军。部队是以连队为单位出发的,每一次都是200人顺序踏上乡间大道,一个人跟随另一个人,前后距离3至5米,分别行走在大路两侧。人们藏身在路旁的壕沟里,沿着沟壁行走,总是寻找有阴影的地方,不错,飞机只有敌方的:这就是我们的反攻。村民们尚未疏散,在留下来的村民面前,我感到羞耻。人们用疑惑的目光望着我们,当我们偷偷地沿着沟壁行走时,他们直对着我们摇

头,我们身着流浪汉似的服装,头戴大小不一的钢盔,脚蹬磨偏了后跟的鞋子。我们用嘲讽的口吻称自己为“做生意的军队”。

以攻为守,就是在森林里,在壕沟里和阴暗的地方藏猫猫。就这样,法兰西教会了它的士兵走向失败。发动机的轰鸣声:敌人有着摩托化的优势;组织性:这是德国人的品德。求胜的意志:这是别人的现实,我们的宣传。假如我们为了进入自己的阵地而乘车和徒步行军的5天里,不是见到每一架飞机便躺下装半个小时的死人,假如我们不是每天夜里像小偷一样,偷偷地穿过每一处路过的地方,假如我们乘坐火车和汽车,而不是在无路的小径上装得像印地安人那样走路,假如我们24小时便到达阵地,而不是花5天时间在法兰西大地上走来走去,说是“迷惑”敌人,实则迷惑了我们自己,累得死去活来,彻底丧失了战斗力,那样我们也许会损失20个人,但是部队不会变成为一堆士气低落的乌合之众。“敌人更强大!”——这种想法在日日夜夜的每一秒钟里,深深印入我们的脑海,这种思想使当年想当兵的难民,又成了难民。我们在圣米歇尔火车站走出车厢。那是清晨3点钟,一个响晴的月夜。我们悄悄地溜出装运牲畜用的货车车厢。一切都应该做得悄无声息,让人无法察觉,仿佛敌人就在我们身后似的。

“哈贝,您的头盔在闪光”,上尉告诫说。

我摘下头盔。

“在上面涂点泥土”,上尉悄悄告诉我。

整整花了两个钟头,全团人马才在火车站集合完毕。加莱,那个戴眼镜的矮个子摄影师;戴索扎,那个高大的葡萄牙矿工;帕卜,那个运啤酒的车夫;安塔尔,那个理发师;凯伦伯格,那个剧院里的舞台监督;还有普尔迪,那个裁缝。在5月清凉的早晨惨淡的月光下,他们各个都显得像死人一般。这令我想起《夜间阅兵》那首叙事诗。拿破仑在检查他那些死去的士兵能否重返战场。我们就是那些死去的士兵。可拿破仑并未检查我们。

我们的队伍开始动起来。我们呈单行穿过圣米歇尔城。这是一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光辉的地名。当年的美国志愿兵曾经拒绝盟军的援助,单独夺取了这个地方。他们曾经两次被打退,这些来自新世界的士兵第三次冲锋时,圣米歇尔牺牲了。在圣米歇尔的墓地里埋葬着三千名美国人。

现在整个城里,仿佛住的都是死人。月光中的墙壁像覆盖着白布。人们像躲避瘟疫一般逃跑了,可瘟疫来到了城门口。偶尔听见一声狗吠,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静。

当熟悉的发动机声重又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尚未离开圣米歇尔城。是德国人知道我们要开拔呢,还是圣米歇尔火车站一直有人把守?空气里弥漫着德国炸弹的刺耳声,与此同时,街道上是一片喧哗声,我们那些履带式车辆全都启动,它们的驾驶员设法跟上大队人马。拂晓前的天光把我们的面孔照得苍白。在敌我双方对峙的沉寂中,人们只能听见飞机那吓人的轰鸣声和履带车辆的嘎嘎声。

这时传来命令声:

“躲藏起来!躲藏起来!”

永远是“躲藏起来!”

我跟莱思富里副官(这是中士与军官之间的一种军阶),一个名叫戴希的红头发的匈牙利人和两个侦察员,瑞士人凯伦伯格和俄国人依牟德斯基,走上路旁一条狭窄的小道。走了几步路之后,我们在沼泽地的石头中间发现了一处岩洞,在我们看来,这是一处安全的藏身之地。没待我们走近岩洞,便从那里面传来一声不友好的喊声:“什么人?”

我们停下来。

从岩洞里传来越发急迫的喊声:“什么人?”

然后从岩洞里爬出一个仿佛人一样的东西,那影子戴着一顶油污的铁路员工帽子。只穿了一条裤子,背带拖在身后,这~~个铁路员工样~~人站在我们面前。

“你们干吗又来打扰我?”那男人问道。